

中国哲学

对于欧洲的影响

中国哲学
对于
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福州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朱 谦 之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375印张 7插页 313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40

书号：3173·291 定价：2.85元

精4.35元



朱谦之先生

(1899—1972)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毛泽东—

（见《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序 言

朱谦之先生，福建福州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于一九七二年去世，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穹年屹屹，著述等身，乐育英才，诲人不倦，为祖国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社会建设人才。他传世的著作亦有数十种，享有盛誉。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及其主要著作具见于戴康生撰的《朱谦之传略》（载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兹不具论，独论其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是朱先生精心结构的一部著作。此稿草创于一九三六年，告成于一九三八年，终于一九四〇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给以高度的评价。新中国建立后，朱先生目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有识者的重视，中西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朱先生想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来发扬中国文化，从而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于是决心把《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用新的观点、方法加以补充修改，改题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重新出版，以广流传。他为修订此书付出很大劳动，自称在一生许多著作中，此书还是较称意的。

根据社会科学分类，此书是中外关系史的一部份，即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近百年来国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注意于中外史地考证问题，虽然有些学者接触到十八世纪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经过，但也只涉及美术、文学、园林建造、漆器和瓷器的外传。可是朱先生之书以偌多篇幅专门论述十八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并结合法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来谈，这还算是别开生面的巨著、值得称道。

此书分为前论和本论两部份。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十八世纪中欧文化的接触，本论才是关于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安排在体例上是恰当的。作者在前论中，举出我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作者能够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火药这一段话来说明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攻破封建堡垒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作用。可见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各种问题。可惜作者没有机会看到马克思曾经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三大发明对西方社会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个惊天动地的变革作出极其伟大贡献的结论。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四二七页）马克思这一提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对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的条件，而且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换一句话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由此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

族，所以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应该有以自豪。全世界都知道四大发明，有关著述也不少，但考虑到它们的社会效果，迄今尚寥寥无几。朱先生论述四大发明时，提到它们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实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中一件大事。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史及世界史者不容忽视的。耶稣会是欧洲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动组织，这点在我国学者中毫无异议。朱先生在此书前编中指出：耶稣会是反动封建社会产物，它在欧洲和新教的斗争，乃贵族地主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而耶稣会士东来传教的原因，是由于英、德各国脱离东罗马教以来，欧洲旧教势力大减，罗马教皇不得不派遣耶稣会士向外开辟新的教区，以弥补在西方的损失。他们在东方传教是一件文化侵略，并与西方的殖民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由于反动成性，他们往往容易充当殖民主义工具，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参加经济掠夺和土地占领。朱先生对耶稣会士的分析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他还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平生、专长和作品逐一介绍和评论，对研究耶稣会的学者帮助不少。我们从《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一章，可以窥见他们对宋儒理学的态度和意见，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的意见，有利于我们对此作比较研究。天主教各教会内部争论的“礼仪问题”，关系到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这个问题引起中外长期的争论，其争端集中于三点：（1）敬祖之礼。（2）祭孔之礼。（3）祭天之礼。换言之，即奉祀祖先牌位是否为宗教仪式？祭祀孔庙是否只为敬孔或含有异端的宗教意义？以上帝二字和以天字称呼造天地万物的真宰是否恰当？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人尊孔敬祖先与崇拜偶像不同，对教徒

可以采取放任态度；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二派就提出反对。耶稣会士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大家争论不休，就向罗马教皇请示，教皇先后派钦差铎罗（一七〇四年）、嘉乐（一七一五年）来华查办。终于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笃与四下谕：凡礼拜祖者不许吸收入教。这样就触怒于康熙帝，他批示：凡不许尊孔敬祖者就不准在华传教。因此传教事业不能发展达一百二十多年。本书对礼仪问题的争论，均有详细的交代和精辟的见解。故可喜。我们认为，礼仪问题的争论，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礼制和风俗习惯的注意和研究，自是一件好事；因而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几乎中断，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十七、八世纪欧洲发生一个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们攻击旧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和阶级制度，攻击罗马公教教会并批评在教会的精神支配下社会的愚昧和迷信。有些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但多数人希望有一位“仁君”，开明专制君主出现。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实现启蒙运动思想。

启蒙运动大师如伏尔泰，莱布尼兹，揆内及百科全书派等人，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认识中国和孔子。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扬中国文化，称道中国的“仁君”和“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事实证明，十八世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中国有许多方面是胜过欧洲的，朱先生在书中已经把启蒙大师关于中国的文物制度，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言论介绍出来，略加评论，大致不差。启蒙时代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极盛时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件承先启后的大事，今得朱先生表而出之，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对于启蒙大师所受中国思想的影响的具体表现，即在传入欧洲的孔子学说中，哪些部分是属于无神论、理性论或唯物论？如何被吸收、改造、表达和见于行事？作者对此往往缺乏足够的叙述和分析。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的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与启蒙运动有关，而且会受到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但中国的影响是外因，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者认为“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样提法值得商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自由平等的斗争口号的提出，不完全受中国影响，同时也受到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民自有他们的传统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来发动这次革命。今不谈法国内在的革命因素和其他革命动力，而只谈中国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似乎不够全面。

朱先生博及群书，对于哲学、历史和中西文化均有湛深的研究，著作亦多，其中已出版的如《扶桑国考证》、《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的影响》和《中国景教》，都是中外关系史中有独特性之作。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这一课题，要求高、难度大，非掌握中西有关资料，博通中西文化知识者无从着手。而朱先生胸有成竹，奋笔直书，二三年间就完成此书的初稿，犹自视慊然，晚年又反复修改补充，勒成新本。为以后研究中外关系史者导乎先路，虽有小疵，无伤大雅。我们认为朱先生撰述此书，固然有追求真理，承先启后的目的，但亦有表彰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励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微意。这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用

新观点写成的，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这与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很不相称。这个学术上的空白，应该由我们迅速填补。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虽然是中外关系史一部分，但仍不失为内容丰富，成一家言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填补这个空白之功。广大读者一定以先睹为快。

朱杰勤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于

广州暨南大学

前 言

一、一九四〇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拙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以抗战期间，流行不广，旋即绝版。本书根据旧稿加以重要的修订与补充，以求更与内容相符合，改为今名。篇章顺序照旧，惟资料方面大为增加，尤以在北京大学善本室得以接触原始资料，如《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中国现状新志》之类，得益不少。又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如马弗利克：《中国为欧洲的模范》(L.A.Maverick: China, A model of Europe) 对于重农学派叙述甚详。小林太市郎所著《支那と法兰西美术工艺》，《支那思想とフランス》等皆前所未见，可供参考。又旧著出版后二年，牛津大学汉学家休斯(E.R.Hughes) 在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 序言第一章中曾数引用此书(伦敦版一九四二年，页12,20,32，序言X—XI)；又一九五一年克利尔(Creel) 在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页325, 343, 所举研究中、欧文化接触的有德之赖赫淮恩(A.Reichwein)，法之平诺(V.Pinot)，英之哈得孙(G.F.Hudson)，美之马弗利克、罗善泰姆(Rowbotham) 等七人，其中第一即提及中国，以我此书为代表。此书既经有人注意，益感有修订之必要。新本立场观点均与旧著不同，乃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十八世纪两种哲学革命之说为今书的指导思想，并力求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问题。

二、本书提出许多新论题，当然须有极丰富的考证，除尽

力应用原始资料之外，更参考现代欧洲及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资料。

(1) 赖赫淮恩：《中国与欧洲：十八世纪之理智的与艺术的接触》(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a, geistige and künstlerische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23. J. C. Powell 英译: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5.

(2) 戈尔述：《中国学书目》(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5 vols, Paris, 1904—1924. 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著作及中国礼仪问题各书目，为最重要之参考。关于礼仪问题，见第二册页869—926，第四册页3125—3126，第五册页3580—3600。又同著者《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La Chine en Europe au XVIII e Siècle*)，Paris, 1908；《十八世纪中国与法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Paris, 1910。

(3) 平诺：《中国与法国精神哲学的形成》(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Paris, 1932。此书可参考页375笛卡儿，347—8巴斯噶(B. Pascal)，314—27培尔(P. Bayle)，329—33麦尔伯兰基(N. Malebranche)，390—6费内龙(Fénelon)，314—46诸哲。

(4) 马弗利克：《中国为欧洲的模范》(Lewis A. Mer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San Antonio, 1946。此书两卷，上卷两章分论十七、八世纪中、欧之思想接触，下卷英译魁奈(F. Quesnay)所著《中国专制政治论》(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5) 后藤末雄：《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一九三三年，东京第一书店。此书参考页324—348モンテスキヨ，349—400ウルテール，410—424ルツソー，425—443デドロ，444—477ケネ，501—524マブリー，49デカルト，50—52パスカル，53—4,531，538—40ペール，305—6マルブランシエ，317—8，322—3フェヌロン、普及版改题《支那文化と支那学の起源》，卷首序言，语极反动，本书斥而不用，以示分别。又同著者尚有《西洋人の观たる支那》，《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回配本，岩波书店，一九三四年。

(6) 五来欣造：《儒教の独逸政治思想に及ばせる影响》，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九年，此书分两编，第一编儒教之政治学，分八章，第二编德国政治思想与儒教，分九章，内第四章莱布尼茨(G.W.Leibniz)，第五章沃尔弗(C.Wolff)，第六章霍尔巴赫(P.H.D.Holbach)均提供极重要之资料。

(7) 小林太市郎：《支那思想とフランス》，弘文堂书房，一九三九年，此书分三章，第二章支那文化の发见とフランス思想，第三章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に及ばせる影响，篇幅虽不多，但颇精彩。

三、本书所用参考资料，涉及各方面，有关于中外交通史的，关于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家著作的，今略举其重要书名如下：

(I) 关于中西交通史的

(1) 玉尔：《契丹纪程》(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1866原版之东京翻印版，二册；戈尔逊新编本，四册，伦敦，1915。

(2) 《马哥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玉尔-戈尔逊译注, 二卷, 伦敦, 1921。张星娘译注: 《马哥波罗游记》第一册, 燕京大学图书馆。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纪》, 三册, 商务印书馆。李季译: 《马可波罗游记》, 亚东图书馆。

(3) 张星娘: 《中西交通史料汇篇》, 《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北京, 一九三〇年, 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第二册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 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4) 哈得孙: 《欧洲与中国》, (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1800), London, 1931。

(5) 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1925。吴泽炎译: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商务印书馆, 一九五七年。

(6) 曼得维尔: 《东方闻见录》及《鄂多立克旅行记》合刊(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and the Journal of Friar Odoric), 《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 812。

(7) Andrae: China und de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Berlin, 1908。安德累《中国与十八世纪》见德经济学者石慕勒(Schmoller)七十岁纪念论文集《国家及历史学纲要及材料》页201—400, 北京大学藏, 单行本。共分五章: (一)关于中国的知识, (二)欧洲所受中国输入贸易之影响, (三)在欧洲中国艺术及其流行之变迁, (四)中国与欧洲经济, (五)中

国与欧洲宪法问题。

(8) 平诺：《关于一六八五——一七四〇年法国人认识中国之未刊文件》(V. Pinot: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a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a 1740), Paris, 1932, 北京大学藏。案此项未发表文件, 包括宋君荣(Antoine Gaubil)、雷孝思(P. Joan-Bapt Regis)、冯秉正(P. de Mailla)、马若瑟(Joseph Heri prémare)、巴多明(P. Parennin)之书函, 及柏应理(Couplet)所提供关于中国问题之资料。

(9) 石田干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现代史学大系》8, 东京共立社, 一九三二年。朱滋萃译, 北平中法学院, 一九三四年。又同著者：《支那文化と西方文化の交流》，《东洋思潮》第十八回配本, 岩波书店。

(10) 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11) 西开斯：《探求契丹》(Sir Percy Sykes: The Quest for Cathay, 伦敦, 1936)。

(12) 斯坦开维赤：《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人之中国趣味》(Belevitche-Stankevith: Le gos; Chinois en France au tomps de Louis XIV), Paris 1910。分二部分, 第一部分三章, 叙述法国与中国暹罗之交通关系, 第二部分四章, 述法国宫廷之中国趣味。

(13) 小林太市郎：《支那と佛兰西美术工艺》东京弘文堂书店, 一九三七年。

(14) 翟尔斯：《中国与中国人》(Gil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第四章《中国与古希腊》1902。

(15)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上海、香港有一九三九年影印本，题《大秦国全录》。

(16) 劳福尔：《中国人对于古代伊兰文明史之贡献》(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1919。有1940年影印本，题《中国伊兰卷》。

(17) 罗伯特斯：《西方旅行中国记》(F.M.Roberts; Western Travellers to China), 上海、香港、新加坡, 1932。

(18) 苏提尔：《中国与西方》(W.E.Soothill; China and the West) 伦敦, 1925。

(II) 关于来华耶稣会士的

(1) 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1930。

(2)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3) Paschal M.D'Elia;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1932。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

(4) 萧若瑟 (Joseph Siao)：《天主教传入中国考》，河北献县，一九三一年。

(5) 裴化行 (H.Bernard)：《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凌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

又《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二册，方学芝一九四三。

(6)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一九三八年。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一九四九年。